

接起来了。

能力建设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举行短期培训和研讨会，以解决研究人员所在机构存在的薄弱环节。有许多因行政管理问题构成研究障碍的不愉快事例，诸如研究机构不把科学家安置到学有所长的岗位上，大学不知道如何管理研究基金款项等等。Lebel说：“科学家和决策者之间常常有很大的隔阂，决策者通常并不知道他们从科研中期望获得到什么，而且管理人员并不知道如何制定财务或其他协议，便于科学家顺利申请到研究基金。”

包括NIH、WHO、UNDP和IDRC在内的一些机构为科学家和管理人员提供撰写基金申请报告和科研机构管理的短期培训班。这些团体把科学家和决策者聚到一起，增加他们之间的沟通。其他一些组织则提供了关于如何申请管理基金和撰写课题项目资助申请的培训。中国已经意识到提高本国管理者技能的必要，周期性选派副职到威斯康星大学或其他的西方大学学习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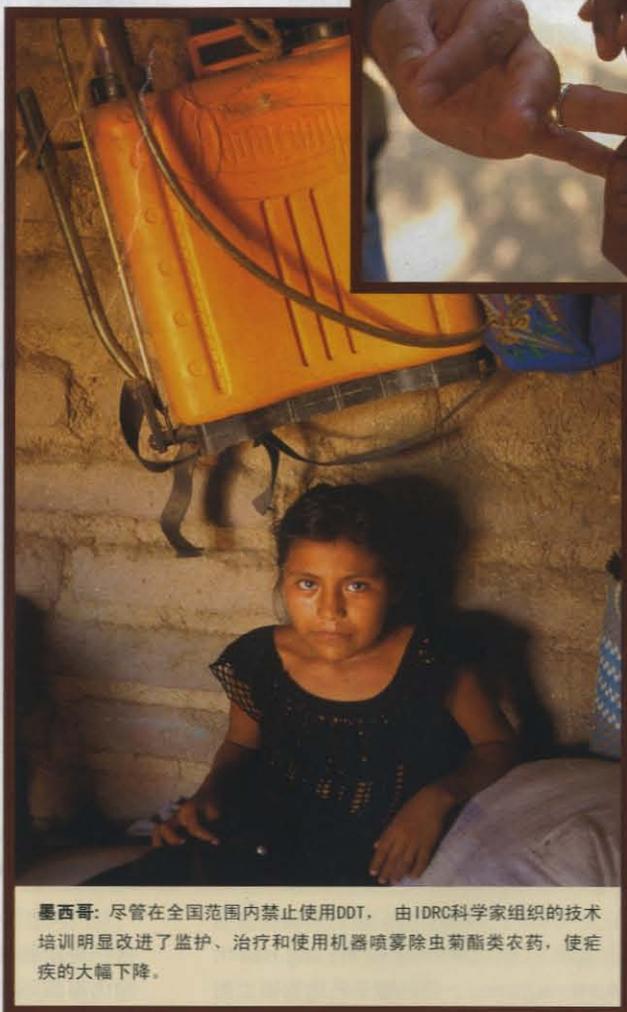
结果评定

对能力建设的结果进行评估是困难的，肯定要比仅仅衡量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以及是否进入领导决策层要复杂得多。从理想的角度，Fogarty国际中心主任愿意看到这些科学家骨干能与美国同行平等地竞争欧洲和北美洲政府提供的资助。“但是，我们怎能不发达国家那些刚刚开始基础课程和实验设施的科学家与已在知名刊物上发表研究论著的科学家相比较？”Nugent问：“又如何把有不同期望的计划项目相提并论？”

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的科研能力要比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强得多，但是这

三个国家仍然面临着世界上最严重的环境卫生问题。Hrynkow说：“有证据显示，信息得到应用的地方科研正在获得成果，但大量环境卫生问题的不断出现，使许多取得的成就显得微不足道。”

Damstra说，看到科研能力构建的长期利益也许是最重要的。合作并不一定需要大量的基金，但确实需要持久地愿意奉献个人的时间和精力



墨西哥：尽管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使用DDT，由IDRC科学家组织的技术培训明显改进了监护、治疗和使用机器喷雾除虫菊酯类农药，使疟疾的大幅下降。

力。合作一旦启动，往往是长期的。Damstra描述了她遇到的世界各地科学家与西方科学家仍继续实施20年前就开始的合作项目。她说：“尽管难以客观地评价这些合作的影响，但在我看来毫无疑问，一些非正式的合作带来了非常成功的研究能力的构建。”

Nugent说，如果没有研究能证明投资健康和环境能帮助经济的发展，就很难说服发展中国家把在环境卫生学领域的科

研能力建设放在优先位置。然而，这种趋势正在扭转，首次证实投资卫生科学研究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报告——世界卫生组织的《宏观经济学与健康：为经济发展投资卫生》(Macroeconomics and Health: Investing in Health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1年出版了。

如果投资环境和健康可使经济增长的

话，Fogarty希望能提供一些衡量尺度。Fogarty的一个新项目，称为“健康、环境与经济发展(HEED)”，将支持研究科研能力的构建对健康、环境与经济发展综合的影响。Nugent希望HEED报告能

够提供决策者所需要的证据，说明环境问题紧系本国人民的健康幸福。

即使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显示环境健康研究能带来经济效益，Damstra、Lebel和其他科学工作者都主张发展中国家需要把构建环境卫生科学的科研能力置于非常优先的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国民面临着许多该地区独特的环境问题。Lebel反问：“如果这些社区的居民都不是从头参与，那又有谁来研究问题并且为社会提供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呢？”

—Corliss Karasov

译自 EHP 111:A464-A469 (2003)

亚洲金融业在前进

从阿塞拜疆到越南，由于亚洲人口数量的指数增长，伴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展及石油和矿产的大量开采，正面临着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尽管其经济在迅速发展，然而亚洲仍然居住着世界上三分之二的穷人。分布在25个国家的亚洲发展银行，已经采纳了新的环境政策，在“扶持穷人”的政策指导下减轻贫困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其中包括使银行的减轻贫困措施与自然资源的良好管理协调一致，支持治理跨国污染问题的合作，帮助各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建立环保意识，以及在所有金融运作中综合考虑环境问题。

—Erin E. Dooley

译自 EHP 111:A459 (2003)